

# 南开大学校史教育读本

(征求意见稿)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编

2014年12月

# 目 录

校名由来.....	1
“公能”校训.....	5
南开道路.....	8
南开品格.....	21
南开精神.....	27
校歌·校徽·校色.....	34
校 歌.....	34
校 徽.....	37
校 色.....	40
校钟沧桑.....	42
历史建筑.....	46
秀山堂.....	46
思源堂.....	49
木斋图书馆.....	52
芝琴楼.....	56
西南联大纪念碑.....	59
严范孙、张伯苓纪念园.....	63
周总理纪念碑和塑像.....	69
杨石先塑像.....	76
陈省身夫妇纪念碑.....	83



## 校名由来

The image show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南开大学' (Nankai University) written in a bold, expressive red calligraphic style.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horizontally and are set against a light, textured background that resembles a piece of paper or a wall.

1946年6月，曹禺和老舍在纽约为庆祝张伯苓七十寿辰曾联袂赋诗一首，其中写道：“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他不慌，也不忙，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也变成学府，带着绿柳与荷塘。”这里面提到的“臭水坑子”便是老天津人俗称的“南开洼”，这句诗说到的便是20世纪早期南开大学从“南开洼”走向八里台的不朽传奇。

南开洼，顾名思义，最初是指天津旧城西门外以南的开洼荒地，即今南马路和南门外大街相交的西南一带地区。明代直沽八景之一的“定南禾风”与清代津门八景之一的“南原樵影”均指此地。1901年城墙被拆除后，城里居民南移，

此地逐渐开拓为城区，但老百姓仍习称“南开”。

“南开”这个校名，不是从学校初创时便有的。南开学校源自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于 1898 年开设的严氏家馆。其后三年，天津著名商业“八大家”之“益德王”家亦设立王馆。张伯苓受聘主持严馆，继而兼理王馆，教授两家子侄，讲授新学课程，开一时风气之先。1904 年严修与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感而思奋，归国后即将严、王两馆合并，面向社会公开招生，正式成立中学，校舍仍在严宅。校名初为“私立中学堂”，后易名“私立敬业中学堂”，旋复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

学校与“南开”二字结缘始于 1907 年。1906 年，天津乡贤郑菊如将自置城南空地十余亩慨然捐赠学校，经张伯苓交涉，换为电车公司附近这块俗称“南开洼”的地方。经过一番周折后，学校于同年 8 月在南开洼起建新校舍，建筑费由王益孙、严修、徐世昌、卢木斋及严子均等捐助，共计银 2.6 万两。1907 年初，学校由严宅迁入南开洼新址，同年秋举行新校舍落成会，便依地名之故，将校名改称“南开中学堂”，这是学校首次使用“南开”这个名字。1912 年 4 月，按照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规定，校名正式定为“南开学校”。学校迁入新校址后，校舍得到扩充，学生数量和私人捐助都有所提高，至 1917 年，学生人数已满千人。

秉持教育救国的强烈信念，严修与张伯苓又分别于1919年、1923年、1928年共同开办了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张伯苓复卓有远见地开办了重庆南渝中学（1938年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并于1938年接办自贡蜀光中学。由私塾而中学而大学，由开创而毁灭而继兴，到新中国成立前，南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系列学府，从南开系列学校走出的人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号——“南开人”。

南开大学立于南开洼，兴于八里台。开办之初，大学教室便建在中学南端的空地上。1922年，学校租定天津城南八里台广地数百亩，起建新校舍，并于翌年6月28日，在八里台新校秀山堂举行了南开大学首届毕业典礼暨新校址落成礼。1934年，当诗人柳亚子到天津看望在南开大学任英文系主任的儿子柳无忌时，南开大学已建设成为“水影林光互抱环”的桃源仙境界。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0年，南开大学学生会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希望毛主席为南开大学题写校徽。毛主席很快便给同学们回了信，信中写道：“来信收悉，照写于另纸。”在随信寄来的一张八开元书纸上，毛主席用毛笔横写、竖写了三四幅“南开大学”校名，并在自己认为满意的一幅横写校名下挑了勾。学生会的同学们如获至宝，立即把毛主席的回信和题字交给

了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并与学校总务部门一起找校徽制作厂家订制了学生用(白底红字)和教工用(红底白字)两种校徽。如今,学校东门上方“南开大学”四个金光闪闪、大气磅礴的字,正是当年毛主席的亲笔题字。

南开校友、戏剧家曹禺先生曾说:“知中国者必知天津,知天津者必知八里台,知八里台者必知南开。”百余年前,南开学校因“南开洼”而得名。1956年,天津市区划更名,将原来的第七区改名为南开区,沿用至今。“南开”这个地名也因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声誉而名扬五洲。

## “公能” 校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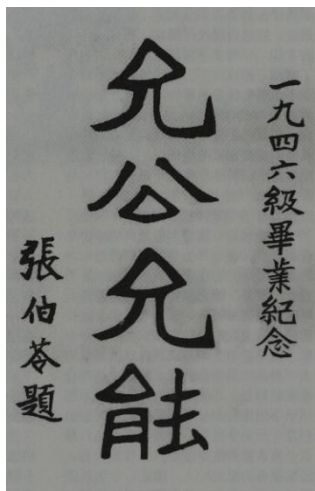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南开校训不是在建校之初即明确提出的,而是在长期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的。早在南开初创之时,校父严修便针对中国社会“私、弱、虚”的时弊,提出了“尚公”、“尚武”、“尚实”的主张。1908年7月10日,严修在南开中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训词中提出了“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的殷切期望,并指出这即是南开设立的宗旨所在。南开“允公允能”校训虽是在严修逝世后才正式提出,但与他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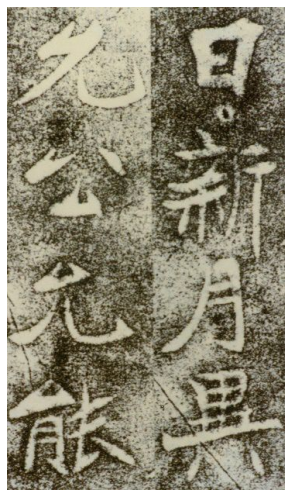
据现有资料记载,1934年10月17日,张伯苓校长在南开学校建校30周年庆祝会上正式宣布,南开以“允公允能”为校训。“允公允能”的句式,出自《诗经·鲁颂》中的“允文允武”。“允”为文言语首助词,“既、又”的意思,“允公允能”意即既有公德,又有能力,德才兼备。



“日新月异”语本《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916年9月20日，张伯苓在修身班讲演中谈到：“进取之说自古有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彼之所谓天行健者，乃指昼夜相承，春秋代继，无时或已，长此不息而言也。吾人读此，则进取精神自然得矣！”可将其视为“日新月异”的思想源头。创制于五四运动前夕的南开校歌中即融合并提出了“月异日新”的办学理念。“日新月异”，即要求“每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但要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张伯苓为1946级毕业纪念题写的  
“允公允能”校训



从张伯苓夫妇墓碑拓片节选的  
南开八字校训(吴玉如书丹)

1944年10月17日为南开学校40周年纪念日，张伯苓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一文中对校训作了具体阐释。他针对“愚、弱、贫、散、私”的社会时弊，指出：南开学校的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唯“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唯“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他总结南开学校40年奋斗历程，提出：“盖南开过去无时不在奋斗中，亦无时不在发展中，日新月异，自强不息，为我南开师生特有之精神。”张伯苓于1951年2月23日病逝于天津，其遗嘱中写到：“凡余所尝致力而未逮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与我同学共勉者，今将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

目前南开出版物上普遍采用以及学校正式公布的南开大学标识系统中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字中文标准字体，源自南开校友、著名书法家吴玉如于1962年为张伯苓校长夫妇合葬墓碑撰写的碑文拓片。近百年来，南开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始终秉承“公能”校训，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筚路蓝缕，愈挫愈奋，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做出了贡献。

# 南开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所走过的道路，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的大学很多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产生的，那时中国积贫积弱、不断衰败，很多学堂都是为了救国强国兴办起来的。因此，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与西方大学源于教会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与近代以来国家民族所走的道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南开大学在创办时虽然是一所私立学校，但与国运也是密不可分，它肇端于威海卫“国帜三易”奇耻大辱之后，诞生于甲午战败十周年之际，开办于因“外争国权”而掀起的五四运动大潮之中，建校目的就是塑造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的治国、强国、富国之才，带有强烈的兴学强国的责任使命。

1898 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威海卫亲历了“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这一年，张伯苓结识了

热心教育、倡导新学的严修，受聘执教于严氏家馆。因此，私立时期的南开大学，作为严修、张伯苓创建的南开学校完整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肇端于严氏家馆。

1904年，时任直隶学校司督办的严修偕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通过考察，二人“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归国后，严修将家馆变为公学，初名中学堂，不久改为敬业中学堂、第一中学堂，1907年又更名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起称南开学校，培养救国强国的才。

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大学部经过多年筹备，1919年秋，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刚建校时，只有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教师也仅有17名，设文、理、商三科。这三科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设立的，带有强烈的“育才救国”的实用性。

初创期的这几年，是南开最艰难的一段历程，学校办学经费极度缺乏，办学条件较为落后。1922年，学校租定八里台附近400余亩土地，开始兴建教学楼（即后来的“秀山堂”）、男生宿舍、女生及教员住宅。此后，又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实业家袁述之的捐助，开始兴建科学馆（即后来的“思源堂”）。1923年8月，学校正式迁入八里台新址，除设文、理、商、矿四科外，并增设预科，初具规模。



早期南开大学校园北部全景（马蹄湖、木斋图书馆）



早期南开大学校园南部全景（左为思源堂、右为秀山堂）

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南开人在一片荒野之地上建起了幽静整洁的校园，图书馆藏书达 20 余万册，教学设备价值在当时的私立大学中名列前茅，甚至超过北京大学等一批国立大学。更重要的是，办学模式也开始从照搬外国向着“土货化”即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南开大学的文、理、商、经等学科都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其中经济学科更是成为当时的一个强项。1927 年 9 月，南开接受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的建议，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由何廉兼主任。南开经济研究所创办之初就开始了天津物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编制了在当时极具权威的南开物价指数。后来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北两省移民东北问题和华北地区工业化问题，以及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其他许多问题，发表了許多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出版了英文版的《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并开始成批招收和培养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后来都在中国经济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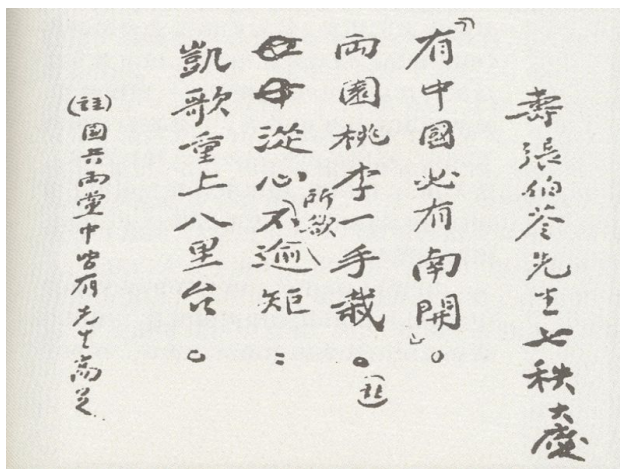
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南开大学已经拥有文理商 3 个学院、13 个系和 2 个研究所，学生 429 人，教职员百余人，成为当时中国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当时天津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天津卫有三桩宝：永利（碱厂）、南开和《大公报》。”

1921 年 9 月，梁启超受邀参加南开大学开学典礼时说：“我们要希望大学能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

术，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梁先生自己曾经要办一所中国大学，没有成功，所以他就对南开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1925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考察南开后称：“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193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价南开大学“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著者”。同年5月20日，教育部视察员在评语中说：“南开大学设备虽受经济限制，然颇能以一文钱作两文钱用，如数学系近购有十三种曲面及曲线数学标本，为国内其他大学所不经见者。其教授待遇虽不优，而能奋勉从事。有教授在职近十年，他大学虽以重聘邀约，亦不离去者。其学生程度亦甚整齐。余等观察时，见商科二年级上经济课，男女生俱以英语笔记，敏捷正确，全班皆然。”

陶行知先生在1934年也指出：“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为祝贺张伯苓七旬寿辰，陶行知先生又手书祝寿诗一首，云：“‘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他注曰：“两园桃李一手栽”是指“国共两党中皆有先生高足”。



陶行知“寿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庆”诗一首

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 6 月，张伯苓到美国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70 余位旅美南开校友在纽约聚会，为张校长庆贺七十寿诞。正在美国访问的南开校友曹禹和老舍闻讯后，联名写下贺诗《贺张伯苓先生七十大庆》，在庆祝会上当场朗诵，其中提到：“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第二年，作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用英文撰写了《教育家张伯苓》一文，指出：“南开与张伯苓两个名字，在中国教育史上永占光荣的一页。”

对于南开大学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指出，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20 世纪 30 年代的南开大学，虽遇到一些困难，但总体上是蒸蒸日上的。但这一发展势头被日寇的侵华战争和对南开的野蛮轰炸所破坏。南开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



被日寇炸毁的秀山堂残迹

1937 年 9 月 10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 16696 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1 月 1 日，师生开始上课。1938 年 4 月，因战事吃紧，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历时八年，三校融合“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紧密合作，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南开全体湘黔滇旅行团成员于贵州盘县合影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师生员工数以千计。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由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就有 832 人（碑上列有 834 人，但曾仲端和王福振均列出两次，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认为应属错列，实为 832 人），实际还不止这些数字。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 295 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 1100 多人，约占总人数的 14%，即每 100 位同学中，就有 14 人曾经投笔从戎，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这 1100 多人，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联在了一起，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但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

抗战胜利后，1947年1月5日，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南开校友会南京分会召集人、中央通讯社唐际清在致辞中说：“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虽然这个发现暂时也许不宜公诸报端，但是凡我南开校友理应为此自豪。”3月19日，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天津市长杜建时也向张伯苓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1946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原校。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结束。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天津八里台原址举行复校开学典礼。此时的南开大学已经改为国立，办学规模比抗战前有了很大发展，共有文、理、工、商4个学院，16个系，学生总数达到1200多人。复校后，南开大学“重视学术研究自由”，“强调热心社会服务，发扬‘公能’精神”，“一切设备、教员皆正规化，重视课程，考试严格，学生素质好、朴实，学习研究风气盛”。



1946年国立南开大学校庆日开学复校纪念照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50年，毛泽东为南开大学题写了校名。1952年，全国高校实施院系大调整，原天津大学的数学、物理系及原津沽大学的贸易、会计、企管等系并入南开，原南开大学的化工系

等调出并入其他高校。调整后，南开大学被确定为综合性大学，全校共设 14 个系，有 18 个专业、3 个专修科，学生 1634 人，教师 277 人，员工 273 人。杨石先副校长在《新南开大学的成立和它的方针任务》报告中，提出了两项任务：一是为国家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二是发扬学术与提高文化，从国家长远的需要来看，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这两项任务的提出，为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58 年 8 月 13 日毛主席视察南开大学

20 世纪 50 年代，南开大学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对院系专业及教学科研方向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1956 年学校成立党委后，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党在学校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57 年，学校制订科研计划和长远科学规

划，此后坚持定期召开科学讨论会，陆续掀起科研跃进的高潮，农药化学、离子交换树脂等研究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1960年，南开大学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

在此后的发展道路上，南开大学也遭受过人祸天灾和挫折困难。所谓人祸天灾，是指“文革”期间，南开除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外，还在空前的自然灾害中损失惨重。

1976年7月28日波及天津的唐山大地震，使我校8名教工和23名学生蒙难，房屋震损2177间，面积77548平方米，精密贵重仪器设备损坏43件，价值56.6万元，直接经济损失总计500万元以上。人祸与天灾同时肆虐，使南开元气大伤。所谓挫折困难，是指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国内高校群雄竞起局面的出现，南开大学在发展中遇到了诸如资金困难、排名下滑、空间受限等空前的挑战。

面对种种磨难，南开人靠着“越难越开”的精神一路顽强走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没有得到特殊资助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横向联合，建成了经济学院楼群、数学学院大楼、东方艺术大楼、蒙民伟楼、日本研究中心等。1995年，南开大学率先通过“211工程”预审，评审专家对南开“得到的比别人少，做的不比别人差”的实干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2000年，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签署重点共建协议，南开大学跻身21世纪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行列。

新世纪新阶段，南开大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主动应对各种挑战，紧紧抓住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津南新校区建设这两大历史性机遇，注重质量特色，优化办学结构，改善办学条件，调整学校布局，迈开了向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奋进的步伐。

回顾南开大学开办以来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南开的前进脚步与祖国的发展步伐是同步的。正如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09 年 2 月 15 日视察南开大学时所指出的：“南开的道路是同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道路紧密结合的；南开的品格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的精神是她青春的精神。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这就是南开这所学校的灵魂。”

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兴旺。南开的发展道路是与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南开人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始终心系国家、淑世爱民，丰富着中国高校担负民族兴亡的精神内涵。这是一条危难时刚毅坚卓、忧国救国之路，是一条和平时昂扬向上、富国强盛之路，是一条为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培育俊彦、贡献力量之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南开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为中国高等教育增添了浓墨重彩。

# 南开品格

南开的品格就是校训所要求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校训作为一所学校办学传统的积淀和价值追求的凝练，集中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师生的价值观念，也是指导学校办学、规范师生品行的圭臬。



2014年8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校训是什么”系列报道中介绍南开校训



诞生于五四运动时代大潮之中的南开大学,开办至今已近百年。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南开形成了心系国家、服务社会的爱国道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品格,充满朝气、面向未来的青春精神。这些都凝结于“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之中。

老校长张伯苓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什么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日新月异”则是“每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但要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这个解读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校训在提出时毕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产物,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例如,张伯苓之所以提出南开以“允公允能”为校训,主要是他认为当时中华民族普遍存在着愚、弱、贫、散、私“五病”,惟“公”才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惟“能”才能去贫、去弱、团结合作。因此,“公能”校训虽然在今天具有穿越时空的现实意义,但当时却是针对中华民族这“五病”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整体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公能”校训的内涵解读也应当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三个倡导”基础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要求后，学校便开始思考如何找到“公能”校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如何将中央新提出的“三个倡导”融入早已深入南开师生内心的“公能”校训之中。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将“三个倡导”的24个字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后，学校经过认真学习，提出：如果把“公”理解为致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家国情怀，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理想，涵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生操守，把“能”理解为修身报国、服务社会、践行“公”之价值观的能力，把“日新月异”理解为追求和践行“公能”过程中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那么“公能”校训便可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南开表达”。找到这个契合点，便可把校训的传承、发展与践行作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新时期南开的办学实践和师生的校园生活，使之成为指导学校办学、规范师生品行的圭臬。

基于上述认识，南开积极挖掘自身办学传统与文化特质，以“公能”校训为载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融入南开的教育改革发展、大学精神培育、校园文化建设之中，使之更加贴近本校实际。



2014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举办  
“公能”校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讨会

在学校发展战略层面，学校把实施南开特色的“公能”素质教育确定为办学基本战略，制定了《南开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着力培养“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勇于创新”的栋梁之才，努力使在校生和毕业生成为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凝结着南开历史传统与办学经验的“公能”校训，传承到今天，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必须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认真实施“公能”素质教育。南开历来注重对学生的品行要求，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的结合；历来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聘请优秀教师承担基础课的教学；历来重视“知中国，服务中国”，强调学以致用和理论联系实际；历来重视体育和美育，鼓励学生要有“坚强之体魄、健全之

精神”。为了继承和弘扬这一办学传统，学校把实施“公能”素质教育确定为办学基本战略，制定了《南开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2011-2015）》，努力培养以周恩来为楷模的“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栋梁之材。为了实施“公能”素质教育，学校提出要推动实现“三个转变”：在办学观念上，从“学科为本”转变为“学生为本”，一切以学生成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教育内容上，从“传授知识”转变为“发展素质”，超越知识教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培养模式上，从“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教学相长”，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师生良性互动。

在具体实施操作层面，学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的要求，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通过讲校史、唱校歌、诵校训、戴校徽、鸣校钟、参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以及评选“伯苓班”、“周恩来班”、“杨石先班”、“周恩来奖学金”等庄严仪式和重要活动，把“公能”校训所表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内涵、新追求，渗透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教书育人实践中，使之在“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浓郁校园文化氛围中，内化为南开人面向新时代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师生们实现中国梦的自觉行动。

为了全面推进南开特色的“公能”素质教育，引导学生“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勇于创新”，德智体美

全面协调发展，南开制订了体现“公能”要求、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指标体系和考评办法，把“公”细化为公之志向、公之操守、公之襟怀三个方面，把“能”细化为生活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审美能力五个方面，开展学生自评、同学互评、辅导员点评，从而确立评价导向，通过“公能”素质考评，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自觉践行校训所凝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前这一工作正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以期发挥“公能”素质考评的激励引导作用。

南开“公能”校训提出至今，80多个年头过去了。这个校训，既承载着百年前南开先贤教育救国的理想和追求，也体现着新世纪南开师生对民族复兴价值引领的理解和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代又一代南开人对“公能”校训的传承、发展和践行，必将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交出不负前人的合格答卷。

# 南开精神

大学之大，首在精神之伟大，这种精神正是大学兴教育人的根基和灵魂。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更需要这种精神的引领和支撑。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大学精神，它集中体现着这所大学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正如英国近代哲学家荷尔丹（Lord Haldane）所说：“在大学里，一个民族的灵魂才反照出自己的真相。”

南开大学建校近百年来，始终坚持自身的历史传统与风格特色，不断培育和弘扬具有南开特色的大学精神，并将之内化到办学育人各项事业中，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曹禺、吴大猷等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胸怀远大的才隽英杰，成就了不同凡响的“南开现象”。

回首南开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激励南开人奋力前行的，正是宏阔厚重、历久弥新的南开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南开（中学）校友温家宝同志精辟概括的——心系国家、服务社会的爱国道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品格，充满朝气、面向未来的青春精神。

“南开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多种解读，但万绪归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始终是其核心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辐射出跨越时空的特质，历久弥新。

**淑世为公、敬业乐群精神。**“南开精神”是强烈爱国忧患意识的结晶，爱国乃南开精神之魂。南开的办学者认为教育的意义在“润身”，尤在“淑世”。“润身”是为个人私己；“淑世”是为社会的发展服务，为强国富国服务。将“淑世”放在“润身”之先，爱国特点鲜明。同强调爱国一样，南开的办学者反复强调为公的精神。“允公允能”的校训就喻示着为公的精神诉求。张伯苓先生多次指出，“‘公’的意思，就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他说，“余敢断言，将来做事能以南开精神成功者，即‘为公’二字”。与“淑世”、“为公”思想一脉相连的是“乐群”精神。“乐群”强调个人融入群体，强调民族团结。在南开的办学者看来，不在个体身上培育起“乐群”的精神，整个民族就缺乏凝聚力。以上述思想为引领，南开大学始终不渝地努力创造“淑世”、“为公”、“乐群”的道德环境，以矫正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国人重“私”之弊病。南开学子们长期在这种人文环境中生活学习，自然有益于养成“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语）的精神。这是百年南开所以能培养出大量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强不息、务实苦干精神。**南开学校由民间力量发轫，在近代中国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外敌入侵的艰难困苦之中萌芽成长，从一所小学校，发展到系列化的大南开，表现出令人惊叹折服的毅力与韧性。1937年，侵华日军炸毁南开大学校园，师生跋涉南迁，继续为国育才的事业。抗战胜利后，南开在所得经费甚少的情況下，凭借自己的力量很快实现复校。1976年，南开遭严重的地震灾害，师生们在地震棚中学习，教学科研工作从未中断。南开还有着务实苦干、不尚空谈的传统，要求学生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拿出“苦干”、“实干”、“硬干”的精神，不取巧，不投机。南开培养学生以“诚”、“真”、“信”三字为根本，推崇诚实、真实、老实、实事求是的道德品质。一些知名的南开校友回忆道：“南开精神表现于行动者，是脚踏实地。南开校友做起事来最忌的是只说不做，浮夸粉饰。与其作大而空洞的宣传，不若任小而实际的工作。”南开在百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作风踏实、诚笃公信的校风，是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一面旗帜的基础，也是南开在新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力量。

**开放求新、与时俱进精神。**南开从来具有容纳中西文化的开放意识。校训中的“日新月异”，既体现在南开办学、治学的宏观思路，也体现在南开传道、育人的具体要求上。办学之初，南开就极力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为富国强国之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延



续传统,把学校的发展放到世界教育的坐标中去定位。同时,南开主张应时求新、与时俱进。秉持这一理念,在改革开放初期,南开以“人所少有,我所专长,人尚未及,我能先登”的胆识与魄力,率先创立了金融、旅游、生物化学等诸多社会急需的应用学科。在一些高校对恢复社会学学科心存疑虑的情况下,南开率先开办了社会学研究班,培养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社会学专业人才。南开还注重以灵活的机制引导学生及早进入科学研究的过程,使培养的学生既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又具有主动的创新能力。进入新世纪后,南开大学更是加大了开放创新的力度,不仅在办学体制上积极探索、大胆出新,兴建泰达学院、深圳金融工程学院、滨海学院等,而且通过设立创新科研基金和实行“弹性学制”来鼓励学生参与科技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开创新型人才辈出,学校发展形势喜人。

南开精神是南开办学实践中长期积淀凝练的文化特质和师生高度认同的价值追求,是南开“爱国、敬业、创新、乐群”优良传统的具体阐释,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南开表达。

以“爱国、敬业、创新、乐群”为核心的南开精神传统,既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又集中体现了南开大学的文化特质、时代特征和价值取向,它与“中国精神”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也是高度契合的。

南开的精神传统是南开人的灵魂。这一精神传统，是创建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内在动力，是南开奋发前进的不竭源泉。它已经成为南开大学最宝贵的财富，也必将在学校未来的发展中进一步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日晷上铭刻的校训字样

**弘扬南开精神，必须坚持爱国道路。**一所杰出大学的发展道路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走强。作为由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与张伯苓创办，诞生于五四爱国运动期间的中国著名高校，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南开始终以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为己任，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

系在一起，始终站在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前列，团结奋斗，尚德报国。这是一条危难时刚毅坚卓、兴学救国，和平时奋发图强、科教强国之路，是一条为中华崛起和国家富强培育英才、贡献力量之路。这条道路体现了南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宗旨。正是坚持这条道路，南开取得了辉煌成就，南开的教育模式不断为中国高等教育增色添彩。

**弘扬南开精神，必须发扬“公能”品格。**由张伯苓亲自制定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是对南开价值取向的高度凝练，蕴涵着南开秉公尽能、奉献创新的精神品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公能”素质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不断输送公能兼济、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就是坚持以“公能”为育人之本，以创新为办学之魂，注重内涵发展，突出特色质量，不断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就是遵循“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理念，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人才、智力和资源优势，卓有成效地提供全方位服务，推动学校发展与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互动共赢。

**弘扬南开精神，必须光大青春精神。**作为汇聚优秀青年的知识高地，南开始终充满朝气；作为培养高素质创新人

才的重要摇篮，南开总是面向未来。这种蓬勃进取、永远年轻的青春精神，是南开自强不息、愈挫愈进奋斗历程的集中体现，是南开包容开放、海纳百川宽阔胸怀的生动写照。保持这种独特气质，南开的发展就要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始终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敢于超越，勇攀高峰；就要坚持把自身发展放到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坐标中去定位，置于现代大学长远发展的宏大维度中来谋划，制订科学的发展战略和措施，推动学校改革和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近百年的沧桑巨变，万变不改其宗的是，一代又一代南开人矢志不渝、薪火相传，用自己的热血与生命，共同熔铸和建构着南开人一脉相承、万众一心的精神谱系，用自己的执着与奋斗不断诠释、践行和发展着南开的爱国道路、“公能”品格与青春精神。

百年南开的发展历史证明，一所学校只要有一种昂扬的爱国、救国、强国的精神，并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就能拥有生生不息的活力。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南开人一定会继往开来，继续发扬南开精神，不断丰富南开精神，为科教兴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 校歌 · 校徽 · 校色

## 校 歌



南开校歌创制于五四运动前夕。1917年5月13日，东京南开同学会十数人召开茶话会，欢迎赴日本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的张伯苓校长和南开运动员。以张蓬仙为代表的留日南开学生在会上提出“校中宜速编校歌”的建议。1918年末，张伯苓校长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返校后，便将创

制校歌歌词的任务交给了南开教员魏云庄先生。魏云庄为前清附贡生，时任校长室秘书兼文牍课主任，被公认为是饱学之士，文学修养很高。在他的主笔下，蕴含着南开教育理念的歌词跃然于纸上。

南开校歌曲谱则借鉴了西方一首经典民歌的曲调。据说这首古老的传统曲调，原名为“Lauriger Horatius”，19世纪被填上新词演化成德国民歌“O Tannenbaum”，后被作为圣诞歌曲传唱，英语译为“O Christmas Tree”。谱曲完成后，张伯苓便将词曲完整的南开校歌交由音乐教员孙润生审定、教唱。校歌歌词短小而精悍，曲调悠扬而激昂，“于聚会之时，千人合唱，以期神会而铸成南开真精神”。

南开校歌歌词全文如下：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駸駸，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南开校歌实际上就是南开精神的颂歌。“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直接高唱出校歌的主题，指出我巍巍南开精神发源于九河下梢、钟灵毓秀的天津。“汲汲駸駸，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意为南开人锐意进取、改革创新之精神犹如水流不息、骏马奔驰，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整句既是鼓舞南开人努力追求、

奋发上进，也比喻南开教育事业不断进取、前途无量。“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既是对南开精神实质的赞颂，又蕴含着南开教育的培养目标，大仁、大智、大勇、大美，真诚淳朴，儒雅谦和。由于南开校歌蕴含着深刻的教育理念和浓厚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学的校歌中独具魅力，近百年来传唱不衰，已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名歌佳曲。

## 校徽

关于校徽的由来，记载着一段南开学校遭遇挫折而精神愈益奋励的历史。1917年，天津遭遇特大水灾，9月中旬南运河决堤，洪水涌入城区，南开学校亦未能幸免。在时任代理校长张彭春的亲自指挥和全校教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先迁往东马路青年会，后迁至河北政法学校。张彭春在当年开学式上发表讲演：“学生之生存在精神，不在庐舍。我师生之精神永在，何往不可有为？岂庐舍淹没，遂能阻我之进步哉！”师生精神大为振奋。在寄宿求学的困难时期，每名南开学生胸前都佩戴着一枚纸制的紫白色临时校徽，时时提醒自己身为南开人更需磨炼意志、砥砺品行、发扬精神。辗转经年，南开师生直至转年7月才得以重返校园。此后，每年的9月23日，学校都要在饭厅里举行一次“水灾纪念会”。全体学生坐在饭桌前喝粥纪念，胸前都佩戴着印有“南开”二字的紫白色卡片，同当年那个一样，只是下面加印了一行小字：“民国六年水灾纪念”。





南开大学早期校徽



南开大学早期校徽

为纪念南开系列学校百年校庆，2004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启用了新的校徽。新校徽为双圆套八角星形，中间是“南开”篆书字样，文字四周是八角星状图像，内环上方为“NANKAI UNIVERSITY”，下方标示南开大学的建校时间“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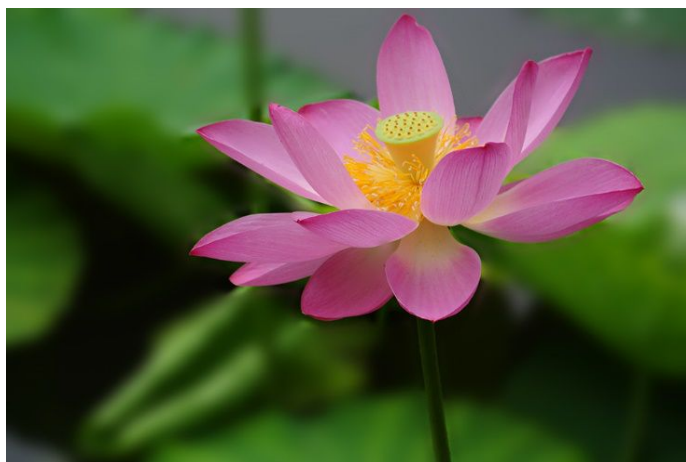
2004年10月17日以前使用的校徽



2004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启用的  
新校徽

南开大学校徽的核心图像为八角星形。八角星形由两个正方形叠加、结合而成，八个角皆为直角，分别指向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一是体现“方方正正做人”之意，二是体现南开人“面向四面八方，胸怀博大，广纳新知，锐意进取”之精神。八角星形方圆互动，融合东西，体现了南开大学“智圆行方”的入世哲学、“追求卓越”的立世哲学和“允公允能”的济世哲学。

## 校 色



南开园马蹄湖荷花

南开大学的校色为青莲紫，又名南开紫。荷花亦名莲花，因“华实齐生、百节疏通、万窍玲珑、亭亭物华”，而被誉为“花之君子”。宋人周敦颐的《爱莲说》，道出了莲花的君子品格——“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写出了莲花虽处污泥之中却纤尘不染，虽经清水洗涤却不露媚态的可贵精神；“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写出了莲花里外贯通、表里如一、不牵扯

攀附的高尚品质。正因如此，莲花才能“香远益清”，这也是南开人历来追求的人生境界。由于青莲紫体现了南开人温厚儒雅、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品格，蓬勃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气质和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鲜明个性，一直为南开人所崇尚和喜爱，故将其作为南开校色，校徽、校旗等一些南开标识物均以之为色彩基调。新颁布的《南开大学章程》第84条对校色做出了明确规定。

# 校钟沧桑

在南开大学校园内，校钟静静地悬在主楼后广场上，凝重古朴，端严肃穆。它记载了日军侵华、炸毁南开、毁灭文明的惨痛历史，更彰显着南开人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愈挫愈勇的奋斗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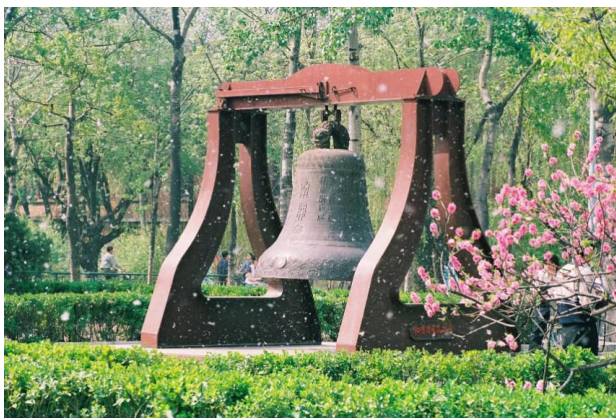


20 世纪 30 年代的南开校钟

1937年日寇毁校之前，校园里曾有一口老校钟置于思源堂西侧，以4根弓形梁柱做支架，悬挂在约2米高的台基上。这口老校钟是德国克虏伯兵工厂铸造，原为德国送给李鸿章祝贺寿辰的纪念钟（一说德国皇帝赠送给清政府的礼物），铜钟钟面铸有整部《金刚经》，重达13000余斤，后李鸿章将此钟施于海光寺。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日军占领海光寺后，把这口钟转送给英租界工部局，作为消防警钟悬挂在维多利亚公园（今解放北园）。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租界工部局才将大钟归还，其时，海光寺旧址已被日军占领，划入日租界范围。1930年，张伯苓校长见海光寺主持还俗，大钟废置可惜，与当局几番交涉后，将大钟移到南开大学作为校钟。

1931年6月20日，南开大学举行第九次毕业典礼暨校钟开钟礼，因当年毕业生共34人，故撞钟34响。据刊于当年《北洋画报》上《八里台听钟记》一文记载：“钟甚大，悬朱红铁架下，掩映绿树丛中，下有高大之石基，周雕花纹，古模而典雅，其声沉着雄浑，坐礼堂中听之，其声锵然，若古寺……”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南开师生为铭记国耻，曾鸣钟3日，先敲9响，次敲1响，再敲8响，钟声轰鸣，声震方圆数里。此后，这口用于每年开学或毕业式等盛大庆典的校钟，便成为悬挂在南开师生心中的警钟。1937年7月29日，日军轰炸南开大学，30日，校钟与一批图书、仪

器设备被日军掠走，从此下落不明。抗战胜利后，张伯苓校长曾致函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恳请其注意搜访抗战时期被日军掠走的南开校钟，但终无音讯。



1997年重铸的校钟

1997年7月，在南开大学被侵华日军炸毁60周年之际，为铭记历史，警示未来，南开校友纷纷捐款，重铸校钟。校钟悬挂在铜铸钟型支架的横梁上，重逾3000公斤，高1.937米，寓意南开人牢记1937年日寇侵华毁校的国耻、校耻。钟的周边雕刻着60枚校徽图案，寓意南开遭受日军轰炸后60载的历程。钟与钟架衔接的钟钮两面是卢沟桥石狮造型，象征“七七”抗战烽火的历史见证。钟上文字由著名书法家康殷、康默如先生书写。钟上面南一侧是“南开”两个大字，面东一侧是校歌，面北一侧是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面西一侧是我校王达津教授撰写的 80 字校钟铭文。铭文如下：

河海泱泱，立学启庠；英彦蔚起，山高水长；  
翔宇负笈，邦国之光；七七事变，仇寇肆狂；  
毁我校园，景钟云亡；今兹重铸，宫声惶惶；  
莘莘学子，济济堂堂；允公允能，蹈励发扬；  
日新月异，科教腾骧；猗欤南开，宏业无疆。



校钟上铭刻的“南开”字样

新铸校钟是由南京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所长、南京静海寺“警世钟”设计者王钟泉设计，江苏冶金机械厂铸造的。校钟的钟槌与警世钟的钟槌同出自一棵有着 80 余年树龄的檀木，堪称一对孪生姐妹。南边的警世钟和北边的南开校钟遥相呼应，提醒国人毋忘国耻！警钟长鸣！



# 历史建筑

## 秀山堂



秀山堂和李纯铜像

秀山堂是南开园内第一座以捐资人名号命名的建筑。

李纯（1874-1920），字秀山，天津人，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1917年任江苏督军，并兼苏、皖、赣三省巡阅使。1919年，严修偕张伯苓南下，游说各地，募集办学经费。行至南京时，李纯慨允愿为南开大学募集20万元，同

时广泛发动北洋军政要员为南开捐资。南开大学成立后，李纯专门发来祝词，其中言到：“我南开私设大学既为倡始，尤所爱国诸公相继兴起，庶愈推愈广遍于全国，将来教育勃兴，人才蔚起，图富图强卓然有以据其大本。自兹以往，安知我中国大学不足比美国大学？安知中国人才不足比于美国人才？安知我中国国家不足媲美于美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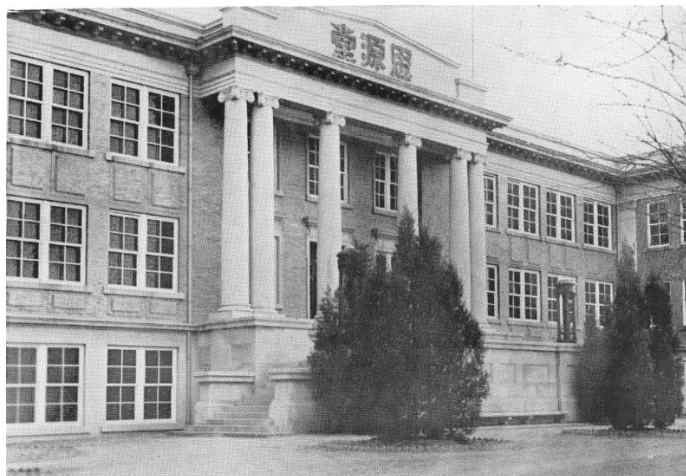
1920年10月，李纯暴病去世，遗书致其二弟李桂山，嘱将其遗产的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作为学校永久基本金以作纪念，另四分之一财产捐施直隶赈济灾民。1921年4月1日，李桂山的代表赵星五在天津懋业银行会见严修的代表武问泉、校董卞倬成、校长张伯苓及庶务课长华午晴，当面交到李纯遗嘱捐助南开大学基金民国元年公债券218.8万元，又现洋48元整，总计约合50万银元，当即存入懋业银行，以期按年生息，作为学校常年开支。李纯被南开学校董事会公推为南开大学创办人，李桂山为基金管理员。



李纯铜像

1922年5月，南开大学在八里台新校址动工起建校舍，至转年6月建成讲堂楼一座，命名为“秀山堂”，共两层，占地3079平方米。6月28日，南开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在秀山堂举行，21名身穿仿美国式学士学位礼服的毕业生，受到各界来宾的欢迎和祝贺，张伯苓、梁启超相继祝词，然后颁发毕业文凭。同时，学校举行了李纯铜像奠基礼和新校址落成礼，并于1924年校庆日当天正式举行了李纯铜像揭幕典礼。当时南开大学文、商科的教室、图书馆、大礼堂及行政办公室均设在秀山堂内，这里俨然成了学校的中枢。1937年7月，秀山堂被侵华日军炸毁，李纯铜像亦被劫掠。1971年，学校在秀山堂原址基础上重建地上一层和部分二层，作为南开大学幼儿园沿用至今。

## 思源堂



思源堂

在南开校园中心花园南侧，有一幢欧式风格的建筑——思源堂，建筑面积 3952 平方米，共三层，高台上的六根罗马石柱是整幢建筑最富特色的部分。作为南开园内完整保留下来的老建筑，朴素庄重的思源堂，见证了南开大学近百年来风雨沧桑。

思源堂由美国罗氏基金团（现称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实业家袁述之先生共同捐资兴建。1922 年 12 月初，美国罗氏基金团派驻华代表到南开大学考察理科教学情况，并旁听

了化学系主任邱宗岳教授的一堂定性分析课。邱宗岳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博士学位，学成归国，执教南开，创建化学系。他讲课语言简练，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熟悉化学科学前沿学术情况，使美国代表对南开大学教学水平留下深刻印象。不久，罗氏基金团决定为南开大学捐助 12.5 万元，用于科学馆的建设和仪器设备的购置。至今，南开园里仍流传着南开教授“一堂课换来一座楼”的佳话。

罗氏基金团在捐资兴建科学馆的同时提出，要以学校自筹一半建筑费为条件。正当张伯苓校长筹措无着之际，袁世凯的嫡母袁太夫人得知此事，即命儿子袁述之认捐。于是，一向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实业家袁述之先生奉母之命，为南开大学慨捐 7 万元建筑费，使科学馆得以于 1923 年 4 月顺利兴工，至 1925 年秋正式竣工。当年的《北洋画报》上专门报道了此事，称“中国妇人，斥巨金，建大学者，自袁太夫人建南开大学科学馆始”。这座科学馆之所以又名思源堂，既有“饮水思源”之意，亦有“思袁”之意，以此纪念两方捐资者。1925 年 10 月 17 日，南开大学举行科学馆开幕式，捐款人袁述之及美国罗氏基金团代表莅会致辞，并邀请著名学者翁文灏作《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的专题演讲。



思源堂旧影

思源堂建成后，南开大学理科四系（算学系、化学系、物理系、生物系）的教室和实验室都设在馆内，图书馆也由秀山堂迁入科学馆二楼。1932年应用化学研究所成立不久，也搬到思源堂的一间大教室。当时，思源堂门前的莲池中遍植荷花，池内备有小船。1937年7月，思源堂在日军轰炸中部分受损，后被日寇用作“天津日本中学校”，莲池亦被填为平地。

1948年，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全市青年“五四”纪念活动在思源堂举行，各大、中学的同学和部分工人、店员、教职员集会于此，思源堂挂上了“科学”匾，升起了“民主”旗。1952年后，该楼定名为“第二教学楼”。1998年，思源堂被列为天津市重点保护二级历史风貌建筑。2004年，经南开大学研究决定和天津市文物局批准，对该建筑进行了清洗和修补工作。九十多年来，当年由邱宗岳先生亲自设计和督建的思源堂，经受住了日军炮火轰炸和唐山大地震的考验，依然屹立在南开园中，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

## 木斋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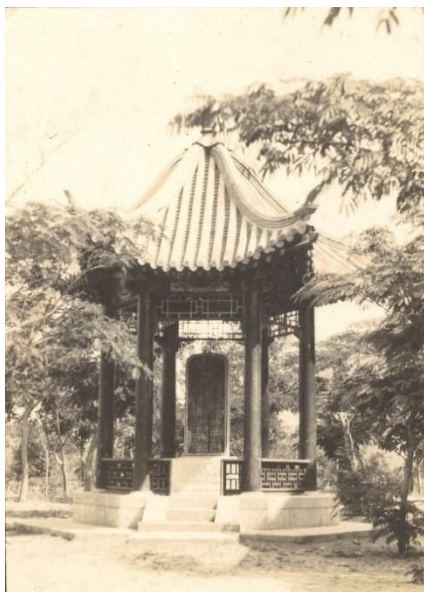
木斋图书馆

木斋图书馆是南开大学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其捐建人是我  
国著名教育家、藏书家、刻书家卢木斋先生。卢木斋（1856-1948），名靖，字勉之，号木斋，湖北沔阳人。在清末担任直隶、奉天提学使期间，他先后捐建了天津、保定、沈阳图书馆，又在各地创办幼稚园、小学、中学及专业学校数十所。民国时期，卢木斋归隐天津，把精力和资财投入教育和图书馆事业中。

1923年南开大学迁往八里台新址后，由于资金短缺，尚无条件修建独立、像样的图书馆。1927年，卢木斋从老友严修处得知此情，在其外甥、南开大学教授黄钰生的积极奔走下，慨然允诺捐出10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工程交付天津基泰工程公司设计建造，为确保工程质量，兴建过程中卢木斋以74岁高龄多次亲往现场督工指点。图书馆历时一年顺利竣工，南开大学于1928年10月17日南开学校24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新图书馆落成庆典，严修、颜惠庆等中外人士四百余人出席观礼，卢木斋亲致贺词，并将图书馆钥匙交给校长张伯苓。为感谢卢木斋先生捐资嘉惠南开师生的义举，南开大学将图书馆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以资纪念。

为充实馆藏，卢木斋以其家藏中文书3万余卷捐赠图书馆，在他的带动下，李典臣、严修、李组绅、颜惠庆等亦先后向南开大学捐赠藏书，加上历年购书，至1934年，图书馆共有中外文书刊14.5万余册。馆藏中除数百种元明善本以外，尤以数学书刊的质量为当时国内罕有，各国最重要的该学科期刊都很完整，来访的外国学者亦称羡不已。





木斋图书馆纪念亭

木斋图书馆以美观、坚固、实用著称，楼为丁字形，建筑面积约 3600 平方米，馆内有可容纳 20 余万册图书的大书库及 400 个座位的阅览室，楼下有研究室、期刊室多处。当时南开大学满蒙研究会（后改为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都在这里办公。馆内还特设区域分别陈列校园微缩模型及照片，展示南开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程。当年柳亚子先生曾到馆参观，赋诗赞道：“百城南面足论功，堂构巍峨缔造雄。十万黄金书万轴，教人长忆木斋翁。”为表彰卢木斋先生捐资助学的义举，国民政府于 1929 年 11 月明令褒奖，特授予其一等奖状，南开大学也于次年在图书馆前建成碑亭以示纪念。

可叹的是，木斋图书馆仅存世 9 年，就在日寇的轰炸焚毁下被夷为平地，所藏图书亦大部被日军劫掠。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从日本追回图书 194 箱，在每本劫后幸返故里的图书扉页上，特地粘贴了“民国二十六年此书被日寇劫去胜利后由东京收回刊此以资纪念”的标记。1951 年，南开大学在木斋图书馆原址上重建了图书馆，卢木斋先生的后人遵其遗愿再度捐资。1958 年，位于新开湖畔的新图书馆（即今天的图书馆老馆）建成投入使用，木斋图书馆改作学校办公楼。

## 芝琴楼



芝琴楼

芝琴楼是南开大学最早的女生宿舍楼，由天津人陈芝琴先生于1929年捐资兴建。陈芝琴（1875? -1947），幼读诗书，长习英语，精通会计，早年做洋行买办，后转至天津英国海关，直到退休。他为人风趣乐观，急公好义，是张伯苓的知交好友，两人同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任事，可谓志趣相投。陈芝琴关心南开成长，热心南开事务，曾担任南开大学商学会顾问，陈家子弟亦在南开学校读书。

南开大学自开办后的第二年即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刚建校时,学生少,上课、住宿都在教学楼里。1921年暑假后学生人数增加,女同学也比往年增加,学校便租赁校外一所民房为女生宿舍。1923年大学迁入八里台新校址后,将临时女生宿舍设在柏树村教师住宅的两套住房中。至20年代末,南开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已超过400名,女生人数也达到几十人,建一座专门的女生宿舍已迫在眉睫。陈芝琴先生得知此情后,于1929年为南开大学慨捐3万元建造女生宿舍楼,位于秀山堂以西,1930年建成后命名为“芝琴楼”。

芝琴楼是一座状如长方盒子的小楼,长约40米,宽约20米,背后有个凹,占地约800平方米。陈芝琴先生不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虽家境宽裕,但主要是靠其不菲的收入和严于律己、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积累而成,3万元对他而言已是勉为其难、几番筹措。但就是这样一幢小楼,却解了南开大学的燃眉之急。学校安排了专门的女生指导员,在女同学自治会的配合下管理女生宿舍。由于管理严格,且在地理位置上与男生宿舍相隔甚远,故芝琴楼曾一度被戏称为“紫禁城”。

当年的芝琴楼前遍栽桃花,成为南开园中的独特风景,这其中还流传着一个南开师生爱国抗日的动人故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态势,驻扎在天津海

光寺的日本兵几乎每天都要到南开园里寻衅闹事。他们得知芝琴楼是女生宿舍，早就不怀好意、虎视眈眈，扬言要在该楼周围种上日本的国花——樱花。张伯苓校长马上找足智多谋的段茂澜教授商量对策，连夜在芝琴楼周围种下桃树。日本人发现后虽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

1937年7月底，日寇野蛮轰炸南开大学，芝琴楼二层以上全被炸毁，一层大部受损。学校南迁后，陈芝琴先生又于1939年捐助重庆南开中学建筑费2.5万元，楼成仍命名为“芝琴馆”。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北返复校，芝琴楼经过修缮，仍作为女生宿舍。1947年陈芝琴先生突然在津病逝，其治丧和后事安排都是由张伯苓亲自主持的。1954年，学校修复芝琴楼，充当教工宿舍和留学生宿舍，后来成为招待所。1976年大地震使芝琴楼再度被毁，修复后改作行政办公的补充用房，现为南开校友总会办公所在地。这座几度损毁、几度修复的小楼，在南开园内虽不起眼，但却值得我们铭记！

# 西南联大纪念碑

1937年7月，南开大学惨遭日寇炮火轰炸，被迫南迁，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翌年南迁昆明，成立了举世闻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同主持校务。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虽历史不同，学风各异，但全体师生秉持“刚毅坚卓”的联大校训，和衷共济，精诚合作，共度了“笳吹弦诵在山城”的八年联大岁月。“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绚烂的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三校即将北返复校之际，为纪念这段珍贵历史，联大师生在校址上树立了西南联大纪念碑，“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南开大学于 1988 年树立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为纪念西南联大建校 50 周年，南开大学于 1988 年 10 月 17 日在校园内马蹄湖西岸树立了西南联大纪念碑。纪念碑由主碑、三校校徽及纪年的基石三部分组成。主碑是由 3 个石块黏合而成的“山”字形大石，碑身正面镌刻着原南开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教授撰文并书写的碑文，落款日期“1987 年 11 月 1 日”是长沙临时大学开学 50 周年纪念日，西南联大以 11 月 1 日为校庆日。

这座联大纪念碑的碑文如下：

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碑

集三校之俊彦，育四海之英才。安贫乐道，师生同济；科学民主，壮志满怀。念八年昆明之既往，迎廿一世纪之即来。

黄钰生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

三校校徽分别刻在3块石板上，3板树立组成三角形，板与板的连接处上方镶着西南联大校徽，象征着三校团结合作组成西南联大的历史。9块镌刻着年份的基石（1937-1945），则象征着联大八年的艰难历程和光辉岁月。



南开大学于2007年树立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2007年9月13日，为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南开大学又在校园大中路西侧尽头重立了西南联大纪念碑。这座从云南昆明联大旧址复制的纪念碑，碑座为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7米，碑身嵌在其中。由冯友兰先生撰写的碑文，与罗庸先生填词的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一阙互相辉映，堪称“双璧”，与闻一多先生为联大纪念碑篆额齐名，世称“三绝”。



西南联大纪念碑树立和传承的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共同塑造的联大精神。

这是一种团结合作、兴学抗敌的精神！联大八年，三校之所以能求同存异、合作无间，除“通家之好”的历史渊源外，最重要的是三校对于办学救亡这一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因而能够置各校局部利益于度外，并且能够与抗战相始终。正如联大纪念碑碑文所记述的：“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

这是一种崇尚科学、追求民主的精神！八年之久，联大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责任使命的勇敢担当。

这是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由中国文学系教授唐兰（战后复员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篆额，数学系教授刘晋年（战后复员南开大学任数学系教授）书丹。这份名录向世人讲述了联大师生强烈的家国情怀，鲜明表达出西南联大全体师生对于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1100多名师生的崇高敬意。这是西南联大价值观中“爱国”的集中体现，并成为中国和世界教育史的“一绝”。

## 严范孙、张伯苓纪念园

在南开园内马蹄湖与思源堂之间的中心花园里，敬塑着南开创办人——校父严修和老校长张伯苓的半身铜像，每逢他们的诞辰和校庆纪念日，南开师生和校友都要到此凭吊。



校父严修半身铜像



老校长张伯苓半身铜像

严修（1860-1929），字范孙，为清朝名翰林，做过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是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积极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教育的先驱者之一。甲午战败使严修备受震动，他深感中国要自强，必须变法维新，而要变法维新，非要创办新教育不可。1897年，严修上书光绪皇帝，奏请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后辞官回津，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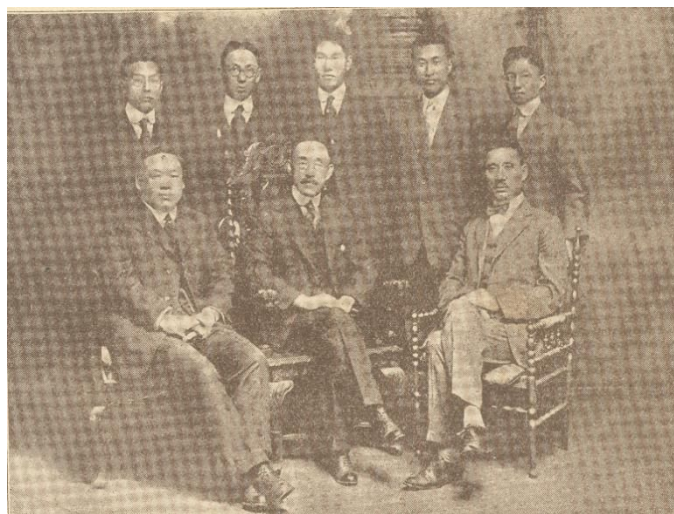
仕家居，将严氏家馆作为兴办新式教育的基地，并为子弟们聘请了一位新学教师——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后以其字行世，1895年10月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此前半年，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一条就是允许日本军队驻扎威海卫。1898年7月，英国强租威海卫，张伯苓随通济轮送清政府官员去办理接收和移交手续，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接收时先下太阳旗，后升黄龙旗，仅过一日，改悬米字旗。他悲愤填胸，深受刺激，深刻认识到：海军救不了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自此，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投身于教育救国的毕生事业。

1898年10月29日，38岁的严修聘请22岁的张伯苓到家馆任英文数理教席，开启了携手兴学强国的共同事业。他们同受国难严重之刺激，共发教育救国之宏愿。1904年，严、张二人考察日本回国后，将严、王两馆合并，招收新生，正式成立中学。此后，二人又分别于1919年、1923年、1928年共同开办了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使南开系列学校初具规模。

在南开学校创办之初，严、张二人就产生了开办大学的设想，由于最初的试办不成功，二人商定，张伯苓先于191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高等教育，严修与南开

校董范源濂等人亦于 1918 年赴美考察。此番游学考察使他们对美国大学的组织与发展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更深切感受到大学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感而思奋,回津后立即筹备开办大学。为筹措南开大学的办学经费,1919 年初,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身体疲弱和刚刚经历的丧子之痛,偕张伯苓开始四处奔走。二人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中,自称是“化缘的老和尚”。他们奔波筹资,既有收益,也坐过冷板凳,挨过白眼,但他们坦然面对,并不介怀。



1918 年严修、张伯苓等人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  
(前排居中为严修、右一为张伯苓)

南开大学的开办和最初发展对严修仰仗颇多。建校之初，严修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给予学校很大支持，而且南开大学于发展之初接收的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多缘自他的社会名望和人脉关系。面对社会上对私立南开大学的种种质疑，严修给予张伯苓坚定的支持与真诚的劝勉。张伯苓曾多次讲过：“个人真万幸，在严先生指导下做事；南开真幸运，由严先生发起。”1929年3月14日，严修去世，《大公报》发表社评，悼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并赞其为南开的发展所作出的孜孜努力。南开大学召开追悼会，张伯苓高度评价了严修的办学功绩，并尊其为校父。

严修对南开最大的贡献，是他为南开选了一位好校长。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担任校长40余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始终秉持着教育救国的强烈信念，历尽艰辛，擘划经营，潜心教育，矢志不渝。他秉持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教育理念，为南开首订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为国家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张伯苓奉献南开和教育事业的精神与成就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全国自信的象征”。



1926年10月17日，严修与张伯苓在南开女中落成典礼上的合影

1986年4月5日，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张伯苓爱国、进步的一生。同日，张伯苓半身铜像在南开大学中心花园落成揭幕。铜像由天津美术学院王之江教授设计，高1.1米，宽1.2米。这座铜像是张伯苓校长在南开学校创建时的形象，他身着西装，面带微笑，目光炯炯有神，仿佛在注视着南开的发展。遵照张伯苓遗愿，他和夫人的骨灰也移葬于此。

1992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中心花园东侧敬塑了校父严修的半身铜像，与张伯苓校长的塑像比肩而立，遥相

呼应。塑像底座背面，刻有 352 字的碑文，简略记述了严修一生业绩。2010 年 4 月 2 日，南开大学隆重举行了纪念严范孙先生诞辰 150 周年大会。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代表学校，深切缅怀了严修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他指出：严范孙先生为南开学校尤其是南开大学的规划创建、劝募集资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以自己的爱国思想、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早期南开的发展，推动南开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所有这些，对南开教育事业而言，都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严范孙就没有南开，严范孙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南开校父”。

## 周总理纪念碑和塑像

南开大学于 1979 年建校 60 周年之际，在马蹄湖湖心岛上树立了周总理纪念碑，碑高约 3 米，宽约 4 米，四周青松翠柏环绕，绿柳红莲飘香。碑的正面，雕刻着周总理侧身头像和其手书“我是爱南开的”六个大字；碑的背面，刻有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的手书碑文，记载着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与南开大学的深厚渊源。



周总理纪念碑



1913年8月，素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志向的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1919年改称南开中学），南开学校注重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教育理念和严格的教育教学管理，对青年时期的周恩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校期间，他品学兼优，国文和数学成绩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参加课外活动，表现出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他与同学共同创办“敬业乐群会”，主持出版《敬业》和《校风》，并先后担任过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和班中干事。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中对周恩来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他的人品与才学深得严修和张伯苓的器重，张伯苓曾多次说过：“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周恩来1917年毕业于南开学校，同年9月东渡日本求学，临行前，写下了那首抒发他青年时期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他在日本度过了一年半的留学生涯。1919年4月，在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周恩来决定回国学习，并于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回到天津，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积极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中。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學開學紀念合影（最後排左一為周恩來）

姓名 **周恩來** 年齡 學齡 男女 籍貫 省 縣市 民國 8 年 9 日 入校 以前所過學校 註冊號 62 學校 學系

家長 關傑 永久通訊處

學履名稱	民國八年秋季		民國八年春季		民國八年秋季		民國八年春季		民國八年秋季		民國八年春季		民國八年秋季		民國八年春季		民國八年秋季		民國八年春季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總數																					

1919年周恩來升入南开大學的入校登記表

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共招学生96人，周恩来经严修、张伯苓批准免试入文科学习。隔了几天，大学部决定改名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成为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学号62。至今，南开大学档案馆里仍然珍藏着当年周恩来的入校登记表和开学纪念合影。大学期间，周恩来利用业余时间建立了“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自任“办事人”，为广大校友服务。他亲自撰写了《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细则》，并在校刊上发表了一封《给南开出校同学的信》，号召校友广提建议，“为南开谋精神上的发展，事业上的改造”。

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创建了觉悟社。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学生领袖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到直隶公署请愿，被反动当局逮捕。这年春节，张伯苓去警察厅看望周恩来和南开其他被捕同学。在狱中，周恩来领导难友坚持斗争，经多方营救，反动当局被迫于7月17日释放全体代表。

周恩来在狱中就有了去欧洲学习的打算，他出狱后，严修与张伯苓议定，用在南开设置的“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李福景出国留学。为此，严修特地给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了介绍信，还专门在严家账上为周恩来立了户头，每半年支款一次，均托人负责转寄。周恩来后来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严修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修回答说：‘人

各有志，不能相强’。”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始终念念不忘。解放前后，他曾多次向张伯苓要严修的照片，并于解放后亲自嘱托严修侄孙严仁曾及相关人员编写严修年谱、整理严修日记。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周恩来与张伯苓及南开校友有了较多联系与接触。他在延安接受天津一家英文报刊《华北明星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谈到：“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活动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1938年5月，武汉一百多名南开校友集会，欢迎到武汉为南开募捐的老校长张伯苓，师生欢聚一堂，周恩来出席并讲话说：“南开除严格之训练与优良之校风外，有两点至可注意：一为抗日御侮之精神，一为注意科学训练。”

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期间，常到沙坪坝津南村看望南开师友，纵论天下大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激励大家团结抗日。在一次对南开师生的演讲中，周恩来结合当时形势对“公能”校训作了新的解释，他讲到：“在当前，公，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神圣的领土；能，就是学习，学好抗日的本领、建国的本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等讲话在南开校友和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肩负千钧，日理万机，仍始终关怀着南开大学的发展，曾于1951年、1957年和1959年三次重返母校视察。1959年视察南开时，他更是几乎走遍了整个南开园，深入到教学楼、实验室、研究所、图书馆、学生宿舍、食堂，与广大师生员工亲切交流，并向全体师生发表了重要讲话。至今，南开大学职工食堂里仍悬挂着一幅当年周总理到食堂就餐的珍贵照片。



1959年5月周总理视察南开大学时在职工食堂就餐



周总理塑像

1989年10月17日为南开大学建校70周年校庆日，周总理塑像在主教学楼前落成揭幕。塑像由汉白玉雕刻而成，高4.75米，坐落于一个2米高的台基之上，台基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手书——“我是爱南开的”，背面碑记则记述了他与南开深刻的历史渊源。塑像由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及南开校友共同捐资塑造，是著名雕塑家傅天仇的最后作品。塑像中的周总理神态端穆，面含微笑，极目远方。每个南开人都将永远铭记并以此为傲：周恩来是南开校友最杰出的代表，是南开精神的象征！

# 杨石先塑像

在南开大学敬业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汉白玉雕像——一位学者左手握书，端然而坐，透过镜片的目光凝视着前方。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第一任校长杨石先。作为南开大学的元老之一，杨石先持续在校工作长达 60 余年，是继张伯苓之后任职时间最长、威望最高的一位校长；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和化学家，我国农药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聂荣臻元帅评价他“堪为学者楷模、人之师表”，著名学者柳无忌称赞他是“纯真的学者，正直的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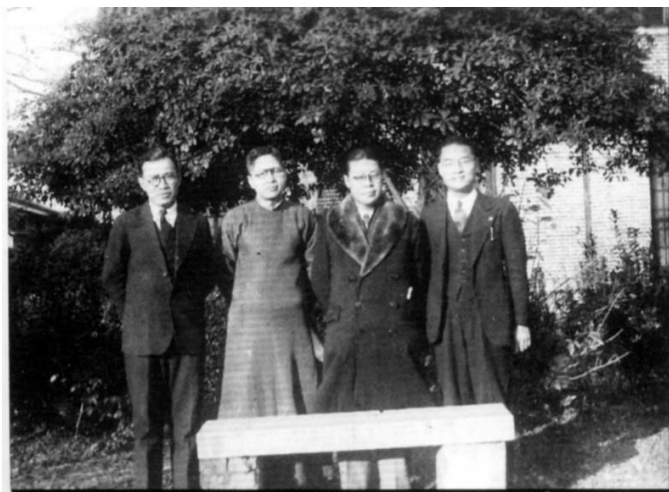


杨石先塑像

杨石先(1897-1985),名绍曾,号石先,从青年时代起就抱有“教育救国”的坚定志向。1923年,他留学归来,执教南开,与邱宗岳教授通力合作,建设化学系,筹备实验室,担负起全校化学课的教学任务。杨石先十分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在当时实验经费和仪器、药品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把化学实验列为化学系学生的一门主课。在他和邱宗岳教授的努力倡导和躬亲示范下,南开大学化学系形成了重视学生基本训练的风气和传统。

1929年,杨石先得到学校资助出国进修,于1931年获得耶鲁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后,继续回到南开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1937年7月底,驻津日军炮击南开大学,杨石先和黄钰生等人紧急组织师生撤退,并转移了部分图书仪器,直到日寇野蛮轰炸校园,才冒着生命危险离开。离开时,他只有身上一套单衣和一架照相机,看到十余年心血毁于一旦,杨石先悲愤之余誓作复校的决心。





1938年杨石先与南开同仁在昆明西南联大合影  
(左三为杨石先，左一为陈序经，左二为方显廷，左四为李卓敏)

1938年4月，南开与北大、清华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杨石先以其学识渊博、教学严谨、为人正直、处事公正而备受师生尊敬与信任，被推选为理学院化学系和师范学院理化系系主任，并于1943年兼任联大教务长。在联大的艰苦岁月中，尽管担任繁忙的行政工作，杨石先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带头讲授基础课。当时联大理学院和工学院异地而设，相距5公里之遥，没有交通工具，他每周两次徒步到工学院上课，不以为苦，且从不迟到、从不误课，为全校教师起到表率作用。杨石先十分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对学生们学业发展道路上的困惑，总是不吝赐教，耐心指导；对学生们生活上的困难，也总是想方设法给予接

济。他不仅在有机化学研究方面有个人的杰出成就，而且言传身教，善育英才，为我国化学界培养和造就了唐敖庆、陈天池、何炳林、陈茹玉、申泮文、王积涛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和教授。

抗战胜利后，杨石先受南开大学派遣第三次赴美，在印第安纳大学作访问学者兼研究员，从事药物化学的研究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他被推选为美国“化学学会”荣誉会员。1947年，杨石先谢绝了朋友和美国同事的一再挽留，放弃了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毅然回到祖国，担任南开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在国事艰难中主持校务，坚持教学。他在美国延聘了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的一批优秀人才到南开任教，为南开大学复校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解放前夕，杨石先拒绝了国民党“南下抢救教授”计划送来的南飞机票，和黄钰生等人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完成了艰苦的护校工作，迎来了天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杨石先历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和名誉校长，成为新时代南开大学的主要奠基人。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他的思想不断取得进步，于196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杨石先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研究方面。通过对国际农药研究的长期观察，他选择了有机农药的研究方向，并在1956年召开的我国第一个“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会议上，响应周总理号召，接受了农

药研制的任务，回校后便组织陈茹玉、陈天池等教师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1958年，杨石先带领化学系师生办起“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毛主席当年视察时给予了很高评价。1962年，他受周总理委托，正式创建了中国高等院校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并亲自担任第一任所长，相继开展了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硅、有机硼、金属有机化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填补了我国化学学科中一个又一个空白，研制出久效磷、螟蛉畏、灭锈一号和除草剂一号等农药品种，为我国农药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1958年毛主席视察南开大学农药车间听取杨石先的汇报  
(前排左一为杨石先)

“文革”期间杨石先受到冲击，但他正气凛然，无私无畏。对于横加到自身的批判和斗争，他都隐忍并承受下来，但当元素所的农药中试车间面临被拆除的危险时，他当即拍案而起，坚持抗争，为元素所保留下一支科研力量。1979年，年逾八旬的杨石先再次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担负起治理整顿学校、培养人才的重任。他将师资队伍的建设作为首要问题，主抓教学科研人员的业务进修，并积极主张打破我国封闭的办学体系，开展国际间的校际交流活动。为此，他不避繁难，亲自处理国外函件、接待外国来访者和即将出国进修的师生。为了办好南开大学，他很少休息，常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1980年，他辞去校长职务退居二线，将全部精力用在指导元素所的发展和研究生培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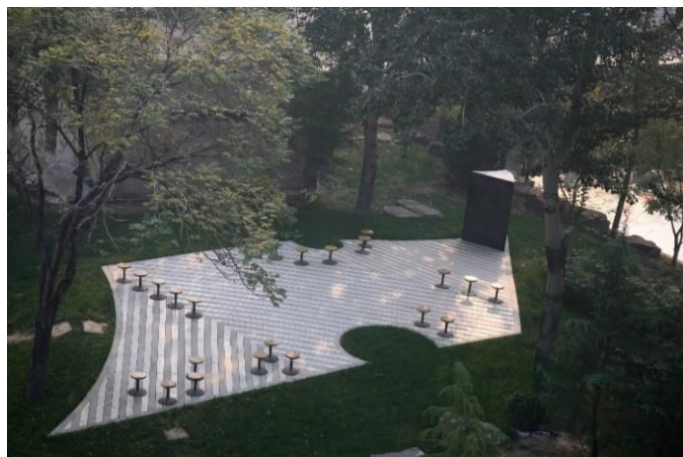
杨石先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南开大学，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1985年2月19日，杨石先逝世，他的遗体曾放在图书馆让南开人瞻仰、哀悼，这样的举措和荣哀在南开大学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遵照杨石先遗愿，他的骨灰被洒在南开园马蹄湖湖心岛的苍松翠柏下，洒在南开园平凡的泥土里。“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这首当年杨石先应联大学生请求题写的陶渊明饮酒诗，也正是他一生高洁品行的真实写照。

为纪念杨石先为南开和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南开大学于1997年其百年诞辰之际，勒石敬塑了杨石先塑像。塑像

通体高 2.95 米，由中央美术学院郭家端教授设计，由校内  
外有关单位和杨老的学生捐资敬立。为继承和发扬杨石先精  
神，发展南开化学学科，南开大学于 2005 年正式启动了“杨  
石先讲座”计划，聘请化学界领军人物担任“杨石先讲座教  
授”。2009 年，南开大学又创立了“杨石先班”，作为授予  
化学学科学生的最高集体荣誉。

# 陈省身夫妇纪念碑

在南开大学省身楼旁那片绿树掩映的坡地上，坐落着陈省身夫妇纪念碑，碑后面便是卫津河潺潺的流水。纪念碑正面是一块贴在汉白玉上的黑色花岗岩，状如一块黑板，上面镌刻着陈省身当年证明“高斯—博内—陈公式”的手迹，以及陈省身夫妇的生卒年份。纪念碑整体横截面为曲边三角形，象征“高斯—博内—陈公式”的最简单情形。整座墓园犹如一个露天教室，庄严肃穆，又不乏自由活跃的学术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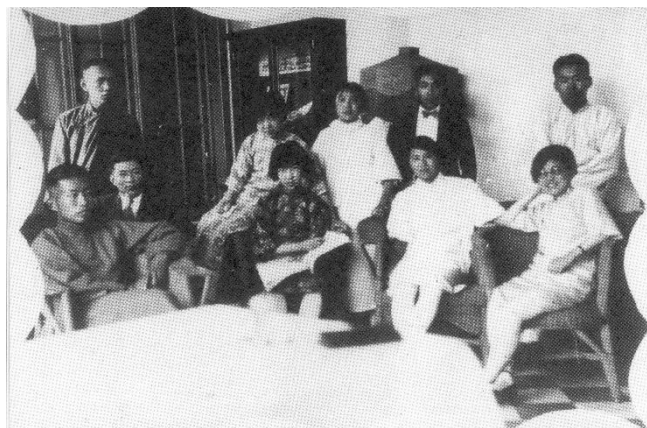
陈省身夫妇纪念碑

从 1926 年考入南开大学,到 1937 年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从 1985 年受教育部委托建立南开数学研究所,到 2000 年在南开大学定居,直到 2004 年在南开园辞世,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里,陈省身“与南开同行四分之三个世纪”。

1926 年秋,15 岁的陈省身顺利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一年级的生活,他过得很舒服,选了微积分、力学、国文、英文、物理五门课,业余时间看了许多小说和杂书。随着算学系主任姜立夫教授于 1927 年讲学归来,陈省身的读书生活与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姜先生治学严谨,教学艺术高超,使陈省身感到“读数学有无限的兴趣与前途”。60 多年后,他回忆道:“我从事于几何大都亏了我的大学老师姜立夫博士。”姜立夫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也十分器重,相继开设了线性代数、复变函数论、微分几何、非欧几何等在当时看来很高深的课程,陈省身学起来乐趣无穷,称自己的基本数学训练都是姜先生口授的。

陈省身的大学生活过得充实而愉快。在这里,他与同班同学吴大任成为至交好友,他们同是数学系最优秀的学生,从二年级起直到毕业二人几乎形影不离。姜立夫重视图书资料建设,在他主持下,数学系图书渐丰,陈省身性喜浏览,经常到图书馆找书看。他随段茂澜先生学习德文和法文,都达到了能读数学书的程度,1930 年毕业时还读过若干杂志

上的论文。大学期间，他还曾当选为南开理学会委员，也是《南开大学周刊》编辑部学术组的骨干。60年后，陈省身故地重游，看到南开和天津的巨大变化，曾深情地说：“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天津度过的，她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我身在他国异乡，但我总时时怀念着启迪我智慧、教给我知识、哺育我成长的母校——南开。”



1929年南开大学理科学会会员合影  
(后立左一陈省身，前坐左二吴大猷)

陈省身在其数学生涯中，几经抉择，努力攀登，终成辉煌。大学毕业后，他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随孙光远先生研究射影微分几何，1932年就发表了学术论文，在数学界崭露头角。此后，他先赴德国，师从著名数学家布拉施克，很快取得了博士学位，后又赴巴黎跟随“20世纪最伟大的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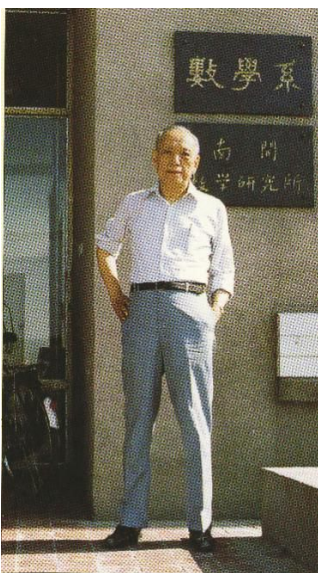
何学家”嘉当作博士后研究。在巴黎的一年时间，陈省身夜以继日地工作，学到了嘉当微分几何的精髓，数学功力突飞猛进。

抗战爆发后，陈省身回国赴西南联大任教，辛勤耕耘了六个春秋。在此期间，他有机会开设一些高深的课程，主要讲授嘉当的重要思想，还与华罗庚、王竹溪联合举办李群讨论班，其水平之高，在当时国际上也属少见。他身边聚集着一批优秀学生，其中包括严志达、王宪钟、吴光磊、王浩、钟开莱等，后来他们都成为了著名数学家，当时在物理系就读的杨振宁也选修过他的课。陈省身日后回忆起联大教书岁月时曾说：“‘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是我一生的幸运。尤其幸运的是这些好学生对我的要求和督促，使我对课程有更深的了解。”

1943年7月，陈省身受邀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在那里，陈省身完成了“一生最得意的工作”：给出了高维黎曼流形上高斯—博内公式的内蕴证明，并发现了“陈省身示性类”，从而开创了整体微分几何的新纪元，对数学乃至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后，陈省身先后主持创办了原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南开数学研究所等三大数学研究所，造就了一批世界知名的数学家。1975年，因陈省身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福特总统给他颁发了美国国家科学奖。

1984年，以色列总统亲自向他颁发了代表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的沃尔夫奖。2004年，陈省身又获得了有“东方诺贝尔”之称的邵逸夫奖。

1972年，随着中美关系改善，陈省身开始回国访问讲学。他在一首《回国》诗中写道：“飘零纸笔过一生，世誉犹如春梦痕。细看家园成乐土，廿一世纪国无伦。”从1978年开始，陈省身在和吴大任等友人交流时，就流露出想建立南开数学所的意愿。在吴大任、胡国定等人的几番奔走下，经邓小平亲自批准，教育部于1984年聘请陈省身担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从此，陈省身为南开数学所和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费尽心力。在数学所档案室里，至今仍存放着陈省身与胡国定200余封30年前穿越太平洋的通信，从介绍著名数学家来讲学，到引进人才，再到筹措捐款，事无巨细。经过筹备，南开数学所于1985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校庆日当天正式成立。陈省身深情地说：“我把最后一番心血献给祖国，我的最后事业也在祖国。我要为中国数学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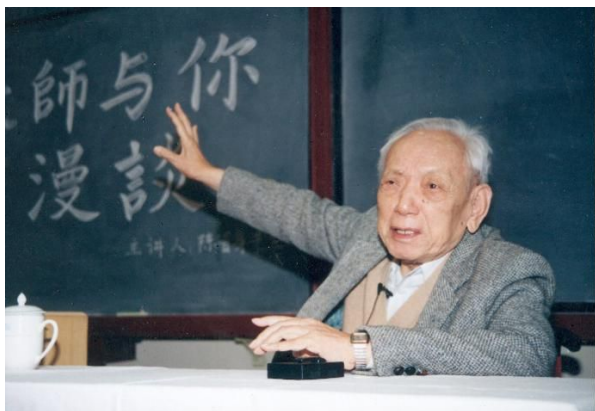


陈省身在南开数学研究所

陈省身对数学研究所十分重视。建所之初，他将自己的全部藏书一万余册和获得的沃尔夫奖 5 万美元奖金全部捐赠给数学所。1998 年他再次捐出 100 万美元建立“陈省身基金”。为推动南开数学快速发展，陈省身曾亲自向邵逸夫先生提出要在南开建数学图书馆并立即得到支持和帮助。他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写信，希望在南开大学建立数学研究中心大楼，得到国家领导和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他说，除了伯龙、陈璞之外，南开数学所是他的“第三个孩子”。

数学所于成立之初就提出了“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所宗旨，在陈省身主持下，数学所组织了学术

年活动，每年邀请国内外著名数学家来做演讲，并于1988年组织召开了“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学术讨论会。陈省身在会上提出“中国应该成为21世纪的数学大国”，被称为“陈省身猜想”，为此，国家专门设立了为数学发展提供支持的“数学天元基金”。在陈省身和中国数学会的积极争取下，有数学界“国际奥林匹克”美誉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于2002年在中国举行，陈省身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陈省身为学生讲座

为纪念陈省身为数学事业作出的贡献，2004年11月2日，一颗永久编号为1998CS2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陈省身星”。同年12月3日，陈省身溘然长逝，上千名南开学子自发地举行悼念活动，手捧蜡烛，聚集到新开湖畔，默默祈祷，

寄托哀思。2009年南开大学90周年校庆之际，陈省身塑像在省身楼落成，塑像中的他目光深邃，仿佛正在思考着数学问题。2010年第26届国际数学家大会首次颁发了陈省身奖章，以纪念这位毕生奉献给数学研究和教育的杰出数学家。2011年6月18日，在陈省身百年诞辰之际，陈省身夫妇纪念碑在南开大学省身楼旁落成揭幕。遵照陈省身遗愿，夫妇二人的部分骨灰安放于此，伴随着南开数学所和他所深深热爱的祖国。